

罗钦顺《困知记》版本源流考

林 展

内容摘要:明儒罗钦顺撰著的《困知记》是程朱理学脉络下的经典读本,存世的版本众多,版式内容互异。本文在现阶段可掌握的文献范围内,逐一梳理其四卷本、六卷本与节本等不同传刻系统。在此文献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四卷本在明嘉靖年间的广泛流传是出于罗钦顺与其同志的刻意推广,意在对抗声势日盛的王学。此书后续的增补,乃至不同版本六卷本的面世,则是后人借此书发声,同样具有针砭王学的现实意义。随着王学在晚明清初的式微,此书的层累过程才告一段落,其在清代虽也数经刊刻,内容则大体相同。

关键词:罗钦顺 《困知记》 王学 宋明理学

明儒罗钦顺(1465-1547)撰著的《困知记》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经典读本之一,其在明清两代刊刻次数之多、影响之广,或许仅有王学经典《传习录》可堪匹配^①。书中对程朱理气论的修正,与对陆王心学的严厉批驳,历来为论者所珍视,相关研究亦不少^②。但对此书的刊行史,却鲜有系统的整理与

①《传习录》详细刊行史,参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学生书局,2013年,第7-24页。

②胡发贵:《罗钦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9-240页;钟彩钧:《罗整庵的理气论》,《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95年,第199-220页;钟彩钧:《罗整庵的心性论与功夫论》,《鹅湖学志》第17期,1996年,第41-73页。

研究^①。嘉靖七年(1528)《困知记》面世时仅有记文两卷,随后经由罗钦顺与后人增补,到万历年间此书再次刊刻时,已扩充为记文六卷,包括《卷上》《卷下》《续卷上》《续卷下》《三续》与《四续》,另有《附录》《续补》《外编》等文字。这直接导致此书的多种刊本、抄本内容不尽相同,版式更是互异,其传刻系统仍有待梳理。更应注意的是,在王学快速扩张的中晚明时期,此书的流行恰恰证明了程朱学者持守与对抗的集体性努力。

一、四卷本的流行及其原因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举进士,嘉靖六年(1527)以吏部尚书致仕^②。罗氏自言“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学”,早年又多“官守拘牵”,是故直到嘉靖初年才终于获得学问上的自信,并于致仕次年将自己长年钻研体究的成果汇编为《困知记》两卷^③。此后罗氏增补此书的过程,则具载于其自撰的传记性文字《整庵履历记》中,相关内容可整理为下表1^④。

表 1 《困知记》历次增续情况表

时间	《履历记》相关记载	《困知记》中对应内容
嘉靖七年(1528)	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今《困知记》卷上、卷下,凡156章
嘉靖十年(1531)	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今《困知记》续卷上,凡80章
嘉靖十二年(1533)	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今《困知记》续卷下,凡33章
嘉靖十七年(1538)	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	今《困知记》三续,凡36章
嘉靖二十五年(1546)	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今《困知记》四续,凡31章

随着内容的增补,相应的序言、识语中亦不乏“续刻”、“并刻”等字眼^⑤,可见此书曾有多罗钦顺自刻本,可惜这些版本并未存世。现存最早有确定刊刻年份的《困知记》,当属嘉靖十六年(1537)潮州府刻四卷本。此本全书每

①参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鮮》,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第514-520页;钟彩钧:《上海复旦大学藏〈整庵续稿〉及其价值》,《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5卷第3期,1995年,第137-141页。阎韬整理的点校本《困知记》,以若干重要明清刊本互校,也简要提及此书增补过程。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下文所引《困知记》内容,若无特别标注,均采用点校本。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罗钦顺》,中华书局,1974年,第7237页。

③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自序》,第1-2页。

④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整庵履历记》,第263-277页。

⑤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续卷上》,第101页。

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单鱼尾,四周单边。全书有记文四卷,附录书信一卷十通;书前有嘉靖七年罗钦顺自序、嘉靖十二年黄芳(1476-1544)序,书末有嘉靖十三年陈察(弘治十五年进士)序、潮州府知府郑宗古(嘉靖二年进士)刻书序^①。郑序说:

京师多谈道之书,予所得凡十餘种,然皆一再阅,置之不复记忆。晚得此编(《困知记》),手之不忍释,坐卧必观,出则携之。(中略)及来潮,即欲板行之。又思翁此编出已十年矣,必有续记,将遣人致书翁所求之。书未发,适潮之贰守晴川刘子来莅任。刘子,翁同邑姻党也。因询其书,刘子出诸袖中以授予。予得之,不啻拱璧,读之数日夜,遂并刻之以传。^②

由文末落款可知,此序作于嘉靖十六年春,结合“又思翁此编出已十年矣”一句,则郑宗古早年所得,当是《困知记》两卷本。此次刊刻,则是合两卷本与续记“并刻之”,然则《困知记》初刻本虽已佚失,其内容却已保留在郑刻本中。为郑宗古提供续记的晴川刘子即刘魁(正德二年[1507]举人),字焕吾,号晴川,江西泰和人,受学于王守仁而毕业于邹守益,有直节之名^③。正如文中所言,刘魁既是罗钦顺之姻亲,又是其学友,双方交往密切。郑刻本附录中便有罗钦顺致刘魁书信两通,论及心性与良知等议题^④。刘魁之任潮州,罗钦顺亲赋诗以赠;前者抵任后,讨论亦仍持续^⑤。由此看来,刘魁所持续记很可能出于罗钦顺所赠。更重要的是,郑刻本受到作者的充分肯认。在收到刘魁回赠此本后,罗钦顺细读郑氏题辞,并表示可想见其“笃信好学”^⑥。

郑刻本有附录书信一卷,包含《与王阳明书》《答允恕弟(罗钦忠)》《答黄筠谿亚卿(芳)》《答欧阳少司成崇一(德)》《答刘贰守焕吾(魁)》各两通,合共书信十通。由于此书早期刊本佚失,已无法确认罗钦顺是否一开始就采取附录书信的做法。单就书信的写作时间而言,《与王阳明书》分别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与嘉靖六年,早于此书初刻的时间,有可能伴随两卷本一同梓行^⑦。而根据此书现存刊本分析,《附录》与正文一样不断增补,并且按照时间顺序

①罗钦顺:《困知记》,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郑宗古刻本。

②郑宗古:《潮州府刻困知记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40-241页。

③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员外刘晴川先生魁》,中华书局,2008年,第447页。

④罗钦顺:《困知记》,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郑宗古刻本,版心页108下-112下。

⑤罗钦顺:《整庵续稿》卷八《送刘贰守焕吾之任潮州用其庆寿之韵》,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版心页14下-15上。

⑥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答刘贰守焕吾(丁酉冬)》,第173页。

⑦《困知记》附录中所收录书信,均注明写作年份,并按写作先后编排。

排列,直到嘉靖二十五年记文最后一卷著成,《附录》中的书信已达二十五通^①。这些书信显然经过罗钦顺精心挑选,详加编年,足以与记文相互发明。在与福州人林炫(正德九年[1514]进士)的书信中,罗钦顺便反复提及应当参看《附录》中《答陆黄门浚明(槩)》一信,并且表示“拙记虽无次序,却有头脑,前后都相贯穿,只要看得浹洽耳”^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除郑刻本外,另有两个存世的四卷本需要留意,分别是《四库全书》收录本与日本京都大学藏题明嘉靖年间抄本。由于修撰体例的限制,四库本《困知记》仅保留了嘉靖七年罗钦顺自序,其他序跋均被删除,仅能从内容上的细微差别稍作推敲。四库本在内容上与郑刻本大致相同,包含记文四卷,附录一卷,但附录收录书信仅八通,到嘉靖十四年所作《答欧阳少司成崇一》为止^③。在存世的绝大部分版本中,记文第一卷第七十六章均作“吾儒只是顺应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尝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弃君臣父母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狱矣。顾彼犹善为遁辞,以谓佛氏门中不舍一法。夫既举五伦而尽弃之矣,尚何法之不舍邪!此下旧本伤冗,今削之。”惟有郑刻本与四库本保留所削语句,作“独有盗取人财,以为饱暖安居之计,乃其所不能舍之法尔。”^④如前所述,郑刻本乃是合两卷本与续记并刻,因此得以保存此章原貌。四库本此章未曾删削,可见其所据原本当是早期刊刻或抄录。从其《附录》收录情况推断,其原本刊刻或抄录时间,当在嘉靖十四年到十六年间。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此本乃“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张若淮为清代名臣张廷玉之孙,《四库全书》中多有善本为其所献^⑤。张家藏有《困知记》旧本,亦是合情合理之事。

京都大学所藏抄本属清家文库,编号926390,标注为明嘉靖抄本,分上下两册。此本同样包括记文四卷、附录一卷,其中内容与序跋与郑刻本大体相同,唯少郑宗古序,且前文所叙记文第一卷第七十六章内容已被删削。由于日后《附录》增补的第十一通信件仍是致刘魁书,作于嘉靖十五年。清家文库本尚未录入此信,可见其所据原本当与四库本相近而稍晚,但大致仍在嘉

①罗钦顺:《困知记》,收录于《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明隆庆四年周弘祖序刻本),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

②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答林正郎贞孚》,第185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罗钦顺:《困知记》,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六年郑宗古刻本,版心页46上-下;罗钦顺:《困知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4册,第297页。

⑤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子部·儒家类三》,中华书局,2003年,第792页。

靖十四至十六年间^①。

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种万历年间的《困知记》节本,明显是以四卷本为基础辑录而成。此本仅单卷,收录在于孔兼(1548-1612)所辑《六子书》中。于孔兼以魏校、吕柟、崔铣、罗钦顺、罗洪先、王慎中六人为“能文而近道,近道而又能行者”,是故选编其文字成书;又以“罗整庵之正学备于困知一记”,因此不及其文集^②。此本卷首有《罗文庄公小传》一篇,当为于氏所撰;内容则从《困知记》前四卷中分别摘取17章、7章、37章与10章,以辨明心性、分别儒释为主旨;另有《与王阳明书》两通、《答允恕弟》、《答欧阳少司成崇一》等早期附录书信^③。无论是选取的记文还是书信,均不及于四卷本之后增补的内容,然则此本当是以四卷本为底本。

存世的多种四卷本《困知记》显示,此前意在作师友讲习之用而仅在小范围内流传的《困知记》,在嘉靖十二年记文第四卷(足本《续卷下》)著成之后,却频频刊刻传播。除罗氏自刻本与郑刻本外,先后也经林希元(1482-1567)刻于岭南、陆燾(1494-1551)刻于苏州,这几种刻本今虽不传,但刊刻序言则俱在^④。短时间内以如此密度与频率传刻,这在理学书籍中是罕见的,其中的缘由应当从作者与传刻者两方面分析。

从义理层面看来,书中有关心性理气的论说,大半是以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学新说为对象。在较小范围的传阅过程中,学友如钟芳、崔铣、罗钦忠等人纷纷对书中主要论述表示赞同^⑤。日后收录在《困知记》卷首、卷末的多篇序

①清家文库抄本已由京都大学图书馆拍摄制作完整影像版,公布于其网站上,此处附链接<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07975#?c=0&m=0&s=0&cv=0&r=0&xywh=-2889%2C-1%2C8849%2C2048> (检索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值得注意的是,《困知记》的朝鲜刻本与和刻本与清州文库抄本高度相似,根据阿部吉雄的研究,此书先是传至朝鲜星州刊刻,在万历壬辰倭乱之际传入日本,由林罗山手抄,日后再衍出万治、宽文、宾永系列刊本。参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鮮》,第514-520页。

②于孔兼:《六子书》卷首《六子书叙》,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版心页1上-8下。

③于孔兼:《六子书》第6册。

④天启年间罗氏后人重刻《困知记》,指出这几种刻本“具在也”;罗珽仕:《重刊困知记后跋》,阎韬点校:《困知记》,第250页。

⑤钟芳:《筠谿文集》卷十三《奉整庵第三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4-65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36-637页;按钟芳幼年曾被寄养于外亲黄氏家,因此一度以“黄芳”一名行世,《困知记》前钟芳所作序言便署作“黄芳”,罗钦顺有《答黄筠谿亚卿》一书,同样是寄予钟芳的。阮元等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三〇—《列传三十四·琼州·钟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年刻本缩微胶卷,版心页32上。罗钦忠:《与整庵兄》,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30-231页。崔铣:《洵词》卷六《答太宰罗公整庵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505-506页。

言也显示,罗钦顺在嘉靖十二年记文第四卷著成时,“删取近年所记而并刻之”,并且有频频将此书寄赠友人请序之举,显见为此书更广泛的刊行做准备^①。而保留在钟芳文集中另一版本的《困知记序》则显示,罗钦顺可能早存有推广此书的意图与用心,甚至早在嘉靖十年记文第三卷著成前后,就委托钟芳为此书作序。

与日后《困知记》广泛流传后引来的追随者与对话者不同,早在此书尚未成篇之时,钟芳与罗钦顺就已针对王学之弊有过深入讨论。同时他也是罗钦顺以外最早为此书作序之人,其《困知记序》广泛见于各种刊本之卷首。然而钟芳文集中收录的序文却与日后依托《困知记》而为人熟知的版本有多处歧异,此处摘录文集中所录版本(简称文集本)如下,并以《困知记》所载版本(简称《困知记》本)对校之^②。

《困知记》(三卷)[四卷],泰和罗整庵先生述其所自得者也。(中略)整庵先生慨然以卫道为己任,爰述是编,根据往言,意皆独得。于凡理气之微,心性之辨,圣学之旨要,治道之机括,神化之妙用,(信口拈掇,新意出焉。非允蹈之不能若是亲切有味。至论朱陆异同,尤为明确,真膏肓之针砭。要之儒与释氏所以异,不越乎思寂一字间,先生于此搜剔不遗余力,辟榛芜而反之正。自昔排斥异教未有若是悉者,)[言之皆亲切有味。而于禅学,尤极探讨,以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惜者,]卫道于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体用皆实,学成则动罔不善。彼释氏者,学之而成,特枯槁自私之士,间能善厥用者,亦吾儒之绪余也。顾乃因似乱真,岂不悲哉!

(先生讳某字某,性颖敏超绝,自乡举进士,三试皆首选,历翰林至冢宰,风操森如,不挠于物,)[先生字允升,整庵其别号,官至冢宰,家居泊然,]锐意营道,老而不倦。盖涵养纯至,故心体融彻,而群言莫能掩也。《记》成,既自为序,谓芳尝备属员,寓书委缀简末。顾寡陋,深惭蠡测,展玩弥日,粗若有契,爰不自揣,僭为之辞。^③

考虑到《困知记》本最终被罗钦顺取用而流传,则文集本很可能是钟芳原先拟定的文稿。从两文的行文措辞来看,《困知记》本显然更为凝练。文集本中诸如“信口拈掇,新意出焉”的说法,更与罗钦顺反复强调“钻研体究”的工夫相悖。引文第二段“讳某字某”的字样则进一步显示其拟而未定的性质。

①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续卷下》,第117页。

②引文括弧中为两种序言歧异处,其中小括弧直线为文集本内容,中括弧曲线为《困知记》本内容。

③钟芳:《笥谿文集》卷六《困知记序》,第529-530页;钟芳:《困知记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34-236页。

此外,对一本理学之书而言,似乎也没必要细数作者的仕宦经历。

两篇序文更重要的歧异在卷数与对《困知记》主旨的概括。首先是卷数之异,文集本所叙《困知记》为三卷,而并非四卷。钟芳极为重视与罗钦顺的交流,对于《困知记》的刊刻增补也有留意,以至于在集中致罗钦顺书信末尾添加双行小字夹注,指明“整翁复信已刊入《困知记》”^①。从这种细致谨慎的态度来看,此处卷数的差异当非误刻。此外,正如前文所言,三卷本《困知记》确实曾刊刻行世,林希元、崔铤等人均曾得阅此本^②,以钟芳与罗钦顺交往讨论之深入,极有可能手持三卷本。

其次,在概括全书主旨时,两文更见差异。《困知记》本单纯视此书为辨别儒释之作,而文集本在儒释主题之外,还强调此书在朱陆异同议题上的洞见。罗钦顺在《困知记·卷下》第四十一章以大量篇幅讨论朱陆之异同,其主旨在以朱子为儒学正统而强调陆学是明心的禅学,言辞激烈^③。更有甚者,记文第四卷(足本《续卷下》)的撰著,实是源于罗钦顺偶得《慈湖遗书》,亦即陆九渊高弟杨简文集的新刊本,怀疑是为陆王学张本的有心之作,是故另辟一卷而着意批判^④。可见文集本的观察无误,朱陆异同确是此书的关键,《困知记》本略去不谈倒显得不合常理。此处需着重一提的是,《困知记》虽然在理念阐发上与王学针锋相对,但或许是罗钦顺顾念与王阳明的交谊,或许是对快速扩张的阳明学派有所顾忌,在前四卷中并未对王阳明作任何点名批评。直到四卷本广泛流传而罗钦顺本人理学声誉逐渐上升之后,在续著的后两卷记文中,才见到直接以王学为禅学的说法。相较而言,罗钦顺对陆九渊、陈献章乃至湛若水等视为与王学一体同源的学者则殊不客气,甚至一度引来学友的不安与劝阻^⑤。钟芳就曾指出,书中人物品评的部分有“指搯”之嫌,可能

①钟芳:《筠谿文集》卷十三《奉整庵第三书》,第637页。

②收录在《困知记》中林希元序文提及“予往得其《困知记》若干卷,刻之岭南。”见林希元:《困知记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37页。这可能是由于此书增补频繁,而后人对卷次有所混淆。林希元文集中此句清楚作“予往得其《困知记》三卷,刻之岭南”;见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七《困知记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75页。崔铤则在为罗钦顺撰写寿序中指出其“著书三篇,曰《困知记》”,见崔铤:《洵词》卷十《太宰罗公七十寿序》,第588页。

③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卷下》,第43-47页。

④关于嘉靖年间《慈湖遗书》的重刊与争议,参吴震:《杨慈湖在阳明学时代的重新出场》,吴震、吾妻重二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3-355页。

⑤参林展:《明嘉靖年间士人对阳明学的回应与挑战——以罗钦顺〈困知记〉的撰写、编刻与流传为例》,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会在读者群中起到“或反滋疑”的负面效果^①。这种审慎的态度恰好可以解释,为何当罗钦顺在增补的第四卷中进一步强调朱陆异同时,钟芳却在序言中删除了相关内容。尤其要考虑到,在这两篇序言写作前后,陆九渊正式从祀孔庙,成为官方认定的真儒^②。

综上所述,钟芳的序言揭示了早在嘉靖十年前,罗钦顺即有意正式刊行推广此书,“以告初学之士,使不迷其所向焉尔”^③,这才有请序之举。至于为何要等到嘉靖十二年第四卷著成才合并刊行,则仍与《慈湖遗书》密切相关。罗钦顺在当年春获读此书,“不觉又有许多言语”,五月即著成第四卷^④,其撰著速度之快,为诸卷仅见,可见对此议题的重视与迫切发声的心理。

从读者与传刻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对罗钦顺的用心显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对书中蕴含的学术创见与针对性也了然于心。陈察强调罗氏“独求坠绪,真积力久,融会贯通,卓有定见,诚立道明。折之必悉其幽微,辨之必究其极致”,认为此书一出,“凡异说之近理乱真,足以惑世诬民者,自此可以少息矣”^⑤。换言之,《困知记》正是平“乱”的正说,而罗氏则堪称程朱之后劲。陆燾认为此书之出,证明了罗氏的理学造诣足与大儒薛瑄相比拟,甚至犹有过之:“明兴,言理学独薛文清为称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后也,而深严缜密,殆于过之。读其书,知其用力于斯道之专且久也。”^⑥有意在理学系谱上为罗钦顺寻找位置。此外,罗钦顺“发身词林以至八座”的显赫仕宦经历,与“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⑦的无疵道德品行,同样为时人所重。相较王阳明屡受私德有缺的指摘^⑧,罗钦顺的自律堪称是儒者言行两照的模范。林希元甚至直言,罗钦顺在嘉靖以后“不就吏部之召,家居为杜门著书”^⑨,乃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圣贤之事。凡此种种,使得程朱学者纷纷自发地在各地刊印此书,并为之作序宣传,最终推动了四卷本《困知记》在嘉靖年间的广泛流传。

①钟芳:《筠谿文集》卷十三《奉整庵第三书》,第637页。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四·礼四·圣师》,第1300页。

③④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续卷上》,第101、117页。

⑤陈察:《困知记后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36页。

⑥陆燾:《书重刻困知记后》,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42页。

⑦林希元:《罗整庵先生困知记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38页。

⑧唐伯元著,朱鸿林点校:《醉经楼集·奏疏附刻·从祀疏》,中华书局,2014年,第173-184页。

⑨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张净峰提学书》,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41页。

二、文献的层累:《续补》与《外编》

在四卷本《困知记》广泛流传的基础上,罗钦顺陆续增补了两卷记文与若干书信,根据《罗整庵自志》与《整庵履历记》的记载,在嘉靖二十五年、亦即罗钦顺逝世前一年,此书最后一个自刻本面世,包含记文六卷,《附录》一卷含书信二十五通;在郑刻本收录书信的基础上,增入《答刘贰守焕吾》两通、《答陈静斋都宪(凤梧)》三通、《答陈侍御国祥》《复张甬川少宰(邦奇)》《答陆黄门浚明》《答林正郎贞孚(炫)》《复南丰李经纶秀才》《答湛甘泉大司马(若水)》(附《湛甘泉原书》)、《与林次崖金宪(希元)》《再答林正郎贞孚》《答林次崖金宪》《答林次崖第二书》^①,但此本同样不传。

存世后续刊本中,时间最接近的是隆庆四年(1570)周弘祖序刻本^②。此刻本共八册,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所录序跋,在郑刻本的基础上,卷首多周弘祖《重刻困知记序》,卷末多陆燠《书重刻困知记后》、欧阳铎《读困知记后语》;除记文六卷、《附录》一卷外,又较罗钦顺自订本多出了《续补》一卷。周序主旨在辨明心与理二,对罗钦顺理一分殊之说甚见称许,其中与此书刊刻相关的文字如下:

大方伯矩轩陈公充养纯粹,每谈学术,独推尊整庵云云。适余携有此《记》抄本,遂躬亲校正,以重梓焉。^③

周弘祖时任福建提学御史,序中所言“大方伯矩轩陈公”,应为当时的福建布政使陈典^④。陈典,河北保定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与名臣杨继盛善而有直名,但是否“推尊整庵”,已不可确知^⑤。考虑到明代地方官刻书,多由提学道官及按察司他官倡导,而持有此书的周弘祖又以一部重要的目录书《古今书刻》闻名,然则校正重梓的工作,很可能由周弘祖本人进行,只是归美于长官;而这个刊刻于福建的六卷本,则本于周弘祖所藏的抄本。

此本多出的《续补》包括《答胡子大中尹(尧时)书》《与钟筠谿亚卿书》《与崔后渠亚卿(铎)书》《答萧一诚秀才书》等论学书信四通,摘取十翼语句连缀

①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164-207页。

②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后经《孔子文化大全》丛书影印出版。李致忠认为此本“版式行款、字体风韵、印纸墨色,颇类隆庆时期风格”,可能即是周弘祖序刻原版刷印;见罗钦顺:《困知记·前言》(《孔子文化大全》本),第204-206页。

③周弘祖:《重刻困知记序》,《困知记》卷首(《孔子文化大全》本),第215-216页。

④此序落款为隆庆四年,时任福建布政使恰为陈典,见郝玉麟等修,谢道承、刘敬与纂:《福建通志》卷二一《职官二》,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年刻本缩微胶卷,版心页17上。

⑤李培祐等修,张豫塏纂:《保定府志》卷五三《列传七·仕绩四》,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刻本缩微胶卷,版心页28。

成篇以阐释太极图的《太极述》，文集自序《整庵存稿题辞》，回应八十眉寿朝廷存问事宜的《谢恩疏并部咨》以及带有自传性质的《整庵履历记》《罗整庵自志》^①。钟彩钧指出《续补》中的文字全从罗钦顺文集《整庵续稿》中抄出，并且大致推测出各篇的写作时间，这得益於明刊本《整庵续稿》以时间先后编排的特点^②。此处需另外指出的是，《续补》文字的辑录，当出于罗钦顺之子罗琰、罗珩等人之手，这点可从《罗整庵自志》相关文字与《整庵续稿》的流传加以证明。

《整庵续稿》与《困知记》中收录的《罗整庵自志》均有小段附录文字。《整庵续稿》中作“(整庵)卒以丁未年四月二十四日，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去家仅五里”^③。《困知记》所收录相关文字则作“右志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④显然这段识语由于要收录进《困知记》中而经过特别改写，而改写之人亦即辑录《续补》之人，对于具体的日期、地点知之甚详，最有可能是罗氏后人。此外，《整庵续稿》虽然在罗钦顺身后刻出，但其中篇目以写作先后编排，迥异于一般文集以文体分类的惯例，可见并未经过妥善整理。此后版藏于家，天启年间罗氏后人刊刻《罗文庄公合集》时，仅收录《整庵存稿》与《困知记》，并未及于此书^⑤。直到乾隆年间再有罗氏后人意欲重刻时，需“遍索之”乃得，且刻板中“字迹多剥蚀未完”，这才重校编排，加以梓行^⑥。可见《整庵续稿》的流传相当有限，而最有可能从此书中辑录出《续补》内容的，莫过于罗氏后人。至于《续补》辑录的时间，必定早于周弘祖作序的隆庆四年，若联系嘉靖三十一年罗钦顺长子罗琰有刊刻《整庵存稿》与《整庵续稿》二书之举，则《续补》的辑录也很可能在此期间。

这个由罗琰等人增补的版本在明清两代持续流传，除周弘祖序刻本外，另有一种明刻本也应同出一源。此本无序跋，每卷卷首题“后学高安陈邦瞻、浮梁陈大绶重校”，尽管版本体式不一，但书中的记文、《附录》与《续补》文字的顺序与内容则与周弘祖序刻本完全相同。陈邦瞻生于嘉靖三十六年

①罗钦顺：《困知记·续补》（《孔子文化大全》本），第671-724页。

②钟彩钧：《上海复旦大学藏〈整庵续稿〉及其价值》，第137-141页。

③罗钦顺：《整庵续稿》卷十三《罗整庵自志》，《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81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354页。

④罗钦顺：《罗整庵自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63页。

⑤李维楨：《罗文庄公合集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58-259页。

⑥冉棠：《罗整庵先生续稿序》，《整庵续稿》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1557)而活跃于万历年间,则此本可能刊刻于万历年间^①。还应注意的是,存世的一种明刊本《居业录》与此本无论是体式、还是卷首“后学高安陈邦瞻、浮梁陈大绶重校”的字样,均完全相同^②。该版本《居业录》题作“合刊三先生语录 居业录”,可见这个陈氏重校本当即《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引“明刊三先生语录本”^③。此外,清代汪绂(1692-1759)读评本也同样是包含记文六卷、《附录》、《续补》各一卷的版本^④。

正如前文所揭示,至少到隆庆年间,《困知记》已经有四卷本、六卷本等多个版本流行于世,但是文献本身的层累并未停止,后续的刊刻者仍有未发之言,而欲借助增补此书来表达。现存的另一种明万历年间刻本,版式与之前刻本不同,显系重新刻板无疑。此本共九册,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黑口单鱼尾,版心下端偶见刻工名字^⑤。卷首除他本常见黄芳、罗钦顺、林希元三人序言外,多万历七年(1579)唐伯元(1540-1597)《重刊困知记序》与万历二十年李桢(隆庆五年进士)《重校困知记序》。卷末序跋则与周弘祖序刻本同。内容在记文六卷、《附录》、《续补》各一卷的基础上,又多《外编》一卷,收录整庵寿序、像赞、祭文等篇目。从两种万历重刊序言并存来看,此本更可能是李桢重校本^⑥。但李桢的工作在于“翻阅校订”此书^⑦,并未言及增补之事,然则《外编》当成于唐伯元之手,这点也可从唐伯元序文中得到印证。唐序中与此书刊印关联内容如下:

《记》凡五续,乃(整庵)先生所手编,刻而传者,吴、越、楚、广之间皆有之。而今承郡伯姑苏张公之命,刻付家藏,辄妄意又增一卷,盖欲备先生言行之概,以示后人。若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呜呼!论先生之所至,吾以待后之君子也。合而观之,规矩之遗意存焉,即程朱复起,

①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一,第6277-6278页。

②胡居仁:《居业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陈邦瞻刊本。

③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2页。

④此本重在汪绂自己评述,因此卷首卷末仅保留罗钦顺自序,其余序跋均被删除,代以《汪双池先生读困知记序》、《清故婺源县学生汪先生墓表》两文,其余内容与通行记文六卷、《附录》、《续补》各一卷的版本相同,只是《续补》少《整庵履历记》一文。见罗钦顺著,汪绂评:《困知记》,国家图书馆藏清汪绂读评本。光绪二十一年,赵舒翘等人又将汪绂评述部分单独辑出,汇编为《读困知记》单行本。见汪绂:《读困知记》,收录于《丛书集成三编》第6册,新文丰出版社,1997年,第311-354页。

⑤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中心,1998年,第81页。

⑥罗钦顺:《困知记》,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

⑦李桢:《重校困知记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47页。

吾知其不能已于传矣。^①

按此序所言,万历七年的这次重刊,虽是出于吉安知府、太仓人张振之之命,但实际主持者则是泰和知县唐伯元^②。考唐伯元,字仁卿,广东澄海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③。在中晚明思想史书写中,唐伯元以其坚定的反王学立场而受瞩目^④。事实上,唐伯元之任泰和,正是由于此前在朝上疏反对王阳明从祀而遭贬谪。履任未几便迅速刊刻反王学立场的《困知记》,唐伯元的用心显而易见,正与其在朝倡言的做法相一贯。序中“辄妄意又增一卷,盖欲备先生言行之概”的说法,与《外编》的增续若合符节,其中收录的内容正是与罗钦顺言行相关的传记性文字。尤应注意的是,《外编》中集中收录了一批寿序,分别是崔铤《寿太宰整庵先生罗公七十序》、罗洪先《贺整庵老先生八十寿序》、黄佐《又序》、陈昌积《又序》。除崔铤文用作罗钦顺七十寿庆,其余三篇均为庆贺嘉靖二十三年罗钦顺八十眉寿。依据《大明会典》,致仕老臣寿跻八十,按例可由地方官员奏报,经朝廷批准遣官存问,以示尊老敬贤之意^⑤。而罗钦顺的八十寿庆,在时任江西巡抚、同样以反王学立场著称的福建人张岳(1492-1553)的主持下,重点放在了“使缙绅学子知钦顺以正学正道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这点上^⑥,受到各方瞩目,这批寿序正是因应此次典礼而作。存问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扭转了罗钦顺此前由于大礼仪立场问题而给世宗留下的不良观感^⑦。此前世宗屡屡以罗钦顺为“非可用之才”^⑧,最终却同意以“优礼耆旧以励后学”^⑨之名慰问,罗钦顺去世之后,更在谕祭文中称许他为“昭代醇儒”^⑩,前后转变不可谓不大。在同时期唐伯元主持修撰的《泰和志》罗钦顺传记中,存问同样被安置于儒学成就的叙述脉络里,并

①唐伯元:《重刊困知记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44-245页。

②余之祯等纂修:《吉安府志》卷三《秩官表》,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万年刻本缩微胶卷,版心页17上。

③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二,第7257页。

④朱鸿林:《晚明思想史上的唐伯元》,载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第359-381页。

⑤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八十《礼部·养老》,广陵书社,2007年,第1260-1261页。

⑥张岳著,林海权、徐启庭点校:《小山类稿》卷二《请存问尚书罗钦顺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⑦胡吉勋:《“大礼仪”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246页。

⑧《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六,嘉靖七年三月乙卯条,第1942-1943页。

⑨罗钦顺:《整菴续稿》卷七《谢恩疏》,版心页19下-20上。

⑩陈昌积:《龙津原集》卷一《太宰罗公殮堂钟铭(有序)》,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间毛汝麒等校勘本,版心页13上-14下。

且感叹朝廷“昭代醇儒”的用词“实属异数”^①。两相印证,唐伯元很可能捕捉到此次存问的背后意涵,而《外编》的篇目去取的目的则在于进一步强调罗钦顺的醇儒形象。

唐伯元在罗钦顺桑梓之地刊印此书,所据原本极可能源于罗氏家藏,这才得以在记文、《附录》、《续补》完备的基础上继续增补。而李桢重校本又以唐伯元刻本为依据,因此能够兼收唐序与《外编》。至此《困知记》文本的层累也告一段落,此后虽仍经多次重刊,也只增入零星篇目,而基本无卷次变化。在众多内容大体类似的后续刊本中,仍有两种需加措意,分别是明万历-天启刻本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这两次重刻均由罗氏族人士主导。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罗钦顺嗣孙罗珽仕以《困知记》旧刻“岁久木朽,付赫蹏不楛”,因此在家藏善本的基础上,重新校刻此书^②;天启三年(1623)又将此书与重刻的《整庵存稿》汇编为《罗文庄公合集》^③。现存的罗珽仕刻本也分为两种,其一是标注为万历刊本的单行本,其二是标注为天启刊本的《罗文庄公合集》本,两种刻本版式、正文完全一致,惟卷首、卷末收录序跋稍有出入^④。可能系刊本脱叶,又或在汇编合集时序言有所增删。罗珽仕刻本是兼具记文、《附录》、《续补》与《外编》的足本,可见其所谓家藏善本应当便是唐伯元刻本或李桢重校本。罗珽仕等人在维持内容不变的前提下,调整卷次篇目,版式也与前本大异,可见确实经过重新编校。此本以原书《卷上》为第一卷、《卷下》为第二卷、《续卷上》为第三卷、合《续卷下》、《三续》、《四续》为第四卷,亦即改记文六卷为四卷;又分《附录》为第五、第六卷,分别收录书信十六通与九通;《续补》与《外编》则为第七、第八卷,并且将严嵩所撰《明故吏部尚书致仕进阶荣禄大夫赠太子太保谥文庄罗公神道碑铭》一文增入《外编》中,这是内容上唯一的改变^⑤。但这种编次方法是所有足本《困知记》中仅见的,

①唐伯元撰:《泰和志·整庵罗先生世传》(存五卷),收录于《原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②罗珽仕:《重刊困知记后跋》,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50页。

③李维桢:《罗文庄公合集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58-259页。

④其中万历本依次收录李维桢序、顾起元序、黄芳序、林希元序、唐伯元序、陈察后序与欧阳铎后语,天启本少李维桢序,多董其昌序、李桢序、罗钦顺自序、郑宗古序、陆粲书后与罗珽仕跋语。见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0-461、924-925页。

⑤罗钦顺:《困知记》,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缩微胶卷。此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胶卷以该本为底本影印制作。

也并不为后续刊本所继承^①。

清乾隆二十一年,罗氏族再次因刻版残缺而重刻《困知记》,同时梓行的还有《整庵存稿》与《整庵续稿》。此次刊刻将卷目编排恢复为记文六卷,外加《附录》、《续补》、《外编》各一卷的方式,并且在卷末最后增入康熙二十八年(1689)邵延龄所撰《告文》,此后《困知记》再无篇目上的增补^②。乾隆刻本在嘉庆四年(1799)曾以原刻版补勘,而咸丰四年(1854)泰和训导吴荣祖与光绪五年(1879)罗氏族罗应毓均在此本基础上加以重刊^③。

与明刊本类似,此书在众多足本以外,另有节本一种。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伯行在福州刊刻此书,“删其重复,择其精醇”而得四卷,收录于《正谊堂全书》之内,同治五年(1866)又由福州正谊书局重刻。此本卷首有张伯行刻书序与罗钦顺自序,不录其他序跋与附录文字,正文内容分别从原书前三卷记文中辑录23章、21章与29章汇编为《上篇》、《下篇》与《续篇》,又从原书后三卷记文中分别挑选12章、14章与1章汇总为第四卷,同样名为《续篇》^④。

综上所述,《困知记》初刻于嘉靖七年,时为两卷本,此后经由罗钦顺本人陆续增补,从嘉靖十二年开始,此书的四卷本开始频繁刊刻流传。罗钦顺逝前将此书修订为记文六卷、附录一卷,嗣子罗琰等人又从其文集《整庵续稿》中辑录《续补》一卷。万历七年再由泰和知县唐伯元增入《外编》一卷。此后这几种版本并行于世。兹将此书版本概况,再以下表综示,下划曲线者代表确曾流传、今已亡佚的刊本。

①清康熙七年江西名儒张贞生曾重刻此书,但其原刻本似乎不传,见张贞生:《序》,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第251-253页。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康熙五十八年重刻本,收录序跋与李桢重校本相同,但多张贞生序,不收录罗琰仕刻本新刻序言;其记文为六卷,《附录》、《续补》、《外编》完备,则此本可能是根据张贞生重校本翻刻。见罗钦顺:《困知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八年重刻本。

②此处仅针对书中正文诸卷篇目而言,不包含序跋,如光绪本便多新刻序跋三篇。

③罗钦顺:《困知记》,国家图书馆藏光绪《申报丛书》本。咸丰四年吴荣祖重刻本现藏北大图书馆,近因馆藏整理,未能得见,此处据阎韬先生点校本收录序跋文字推断;点校本所据版本以明刻本为主,清刻本仅限吴荣祖刻本一种,却完整收录乾隆本新刻序跋与增补《告文》,加之刊刻者吴荣祖时任泰和训导,则其所据底本当为乾隆刻本,或是嘉庆补刊本。

④罗钦顺:《困知记》,香港中文大学藏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局重刻本。

表2 《困知记》版本概况表

记文两卷(可能另含《附录》一卷)	明嘉靖七年罗钦顺自刻本
记文三卷(可能另含《附录》一卷)	明嘉靖十年罗钦顺自刻本,林希元刻本
记文四卷,《附录》一卷	明嘉靖十二年罗钦顺自刻本,明嘉靖十六年陆燾刻本,明嘉靖十六年郑宗古刻本,《四库全书》收录本,清家文库藏嘉靖年间抄本
记文六卷,《附录》一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罗钦顺自刻本
记文六卷,《附录》、《续补》各一卷	明罗琰增补本,明隆庆四年周弘祖序刻本,明陈邦瞻、陈大绶重校本,清汪绂读评本
记文六卷,《附录》、《续补》、《外编》各一卷	明万历七年唐伯元重刻本,明万历二十年李楨重校本,明罗珽仕重刻本,清康熙七年张贞生重校本,清乾隆二十一年初刻、嘉庆四年补刊本,清咸丰四年吴荣祖刻本,清光绪五年罗应毓铅印本
节本	明于孔兼《六子书》本,清正谊堂丛书本

四、结语

本文在现阶段能够掌握的文献范围内,述析了《困知记》的增补过程、明清两代各种版本与大概流传情况,从文献角度证明中晚明时期在王学流行的刺激下,传统程朱理学立场的复苏,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于相应学术领袖与经典读本的渴求。明代中期以后,新学继起,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之势渐告瓦解。王阳明结合学术与事功达至的成就,成为大多数明人眼中真正儒学的表现。《困知记》的撰著正当这个时代背景下,罗钦顺本人的治学也与王学的发展紧密相连,此处可试举几例。罗氏自言“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学”,时当弘治十八年前后,正是王阳明与湛若水定交讲学之际^①。如今可见罗钦顺首次参与理学辩论,是正德十五年与王阳明关于“格物”与《朱子晚年定论》之争^②。嘉靖七年《困知记》首两卷著成之际,罗钦顺更有意以此书寄赠阳明,接续往年论辩,只是因当年阳明下世而不得^③。可见《困知记》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王学兴起的反应性著作。在此书的增补与传刻过程中,尤应注意到从嘉靖七年初刻到嘉靖十二年广泛梓行之间,罗钦顺与学友之间有充分的讨论与反馈,日后流行的四卷本更是罗钦顺频频请序之后的有心之作。而站在传刻者的角

①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年谱一》弘治十八年乙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26页。

②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庚辰夏)》,第141-146页。

③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戊子冬)》,第146-148页。

度,此书所具备义理层面的针对性、罗钦顺本人的声望与品行,无不是他们针对王学持守与反击的利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印默契,共同造就了此书在嘉靖年间的流传与普及。

《困知记》在文本意义上的层累同样揭示了此书在明清两代的定位与命运。正如前文所揭示,此书增补与刊刻最频繁的时期,恰好也是王学快速扩张、乃至臻于顶峰的阶段。在罗钦顺屡屡增续、唐伯元刻意辑补的背后,是王门讲会风行天下、王阳明从祀孔庙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压力。作为程朱学最新的经典读本,《困知记》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强烈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的,其在明代的刊刻频率与次数,甚至要超越王学经典《传习录》。而随着晚明由王返朱思潮的兴起,此书的增补也告结束,虽然多次由罗氏族重刊,却往往无法避免刻板侵蚀、世难求书的境遇。换言之,当王学逐渐成为明日黄花时,《困知记》也因为失去了最重要的对话对象而令其现实意义大受削减,甚至被束之高阁,这恐怕是罗钦顺与其学友意想不到的。但对研究者而言,这种隐藏在学说互动、竞合背后的现象与结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作者简介】林展,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系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明代思想文化史。